

【论 文】

边疆思想史¹

——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

袁 剑²

摘要： 边疆作为认知中国的一种重要知识性空间，对于理解历史与当下中国的连续性与整体性具有重要意义。当下的中国叙述存在着一种“两难”，一方面，存在着古代中国空间的区分性叙述，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叙述中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转型期的存在，形成了对于中国空间结构的古代与近现代认知框架，如何形成中原与地方、古代与近现代的整合性认知，是我们理解中国的关键所在。基于为中国历史空间中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构筑整体叙事框架的可能与尝试，“边疆思想史”作为一种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中央王朝对于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其上的诸族群的治理政策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揭示，着重关注的是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生成的内部关系逻辑及其网络。本文就“边疆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及其可能作出了初步的叙述尝试。

关键词： 边疆；中国叙述；时空结构；边疆思想史

一、边疆：一种古今持续的历史空间

从古至今，作为一种标识界限并区分内外空间的边疆始终存在于人类各群体的认知与实践当中，并随着民族国家时代的到来而在疆域版图层面得以分类性地体现出来。如果说人类的族类变迁构筑了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民族主义的历时性想象谱系的话，那么，边疆则构成了人类所生活着的地球上各个政权实体中与中心定位相对的边缘位置及其社会状态。如果从“洲”的维度来衡量，那么，我们当下久已熟悉的“亚洲”实际上曾经是“欧洲”的广阔边疆。正如段义孚先生所指出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已经知道，在通往东方和西方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大片的陆地，他们将其分别称为“欧洲”和“亚洲”，而在这之后，这两个词汇就被赋予了政治和经济的含义，到了近代的大航海时代，这种关于已知世界的两分法逐渐有了新的意义，“欧洲和亚洲都意味着一系列港口的腹地，前者是从西班牙加的斯到挪威特隆赫姆一线，后者则是从阿拉伯到日本之间星罗棋布的港口的连线。……到17世纪末，西方人觉得有必要给自己的文明找到一个具有概括性的名字……而‘欧洲’正好切合了人们的需求。它指明了一个历史、人种、宗教和语言都同根同源的地域。欧洲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具有完整的含义。而亚洲并非如此，它仅仅是‘非欧洲’的部分，是以这样一种否定形式来定义的，而且是以欧洲人的意愿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才有了‘近东’、‘中东’、‘远东’这样的说法。……对于欧洲来说，亚洲曾经只是灯火阑珊处的那一抹倩影，但是欧洲人有能力画出这个影子的实际轮廓。”³在“洲”的维度之下，由于人类群体特有的自身中心主义认知框架，更是存在各式各样的中心-边疆划分，并同时存在历时性和空间性认知方面体现出来。

边疆作为一种历史空间，具有广泛的世界知识基础。德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卡尔·施密特指

¹ 本文刊发于《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²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³ [美]段义孚著，志丞、刘苏译：《恋地情结》，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0-61页。



出：“在古代，地域的界限是由神话意象来划定的，例如海洋、巨蛇或者赫拉克勒斯之柱。而它的政治保障则是由排外性的防御设施来实现的，比如界河、长城、（古罗马帝国的）界墙（Limes）。比如伊斯兰法律中有和平家园（德文：Haus des Friedens；阿文：dar-el-Islam）这个概念——和平家园之外尽是战争的区域。上述这些界限的意义在于，它们将和平的秩序与非和平的无序，将宇宙和混沌，将家园和非家园，将保护区和荒野，彼此区分开来。这些界限蕴含了当时万民法上的一个分疏。相反，18、19世纪的相邻两个陆地国家的边界含义并非彼此排斥，而是国际法上的相互承认——承认边界之外的邻国土地并不是无主的。”¹

在更广的层面上，人类学家托马斯·M·威尔逊（Thomas M. Wilson）和政治学家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则认为边疆是一种“在宽度上多变，既可以跨越边界，也可以远离边界，民众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可以经由协商而具有多种行为和内涵的区域”。²在他们看来，边疆就是国家边境周边区域所具有的特征，而边疆内部可以具有交互性。在具体的学术实践上，美国、俄国、殖民帝国时代的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国，以及中国周边各国的边疆认知，在时空维度上具有各自足够的边疆实践经验与代表性，并对中国自身的边疆认知框架及其治理实践形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美国的边疆开拓及其以特纳学派为代表的理论阐释，不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塑造了美国的建国史和发展史，而且还成为塑造“美国性”的重要推动力；³法国的“自然边疆”观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成为塑造法国历史与现实认同的主要理念；⁴西班牙研究北美帝国史的学者，则以交替使用“边地”和“边疆”而著称。⁵有地理学家甚至认为，边疆就是“政治景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共同特征”，但是，随着国家边界的确立，到了“20世纪，仅存的边疆大多已经消失”。⁶总体而言，由于学者在不同领域所受的学科训练存在差异，所以在相关的比较研究层面，无法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共同语言。⁷

同样，在中国，由于历史阶段性的差异，边疆也相应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图景。在中国传统王朝的历史空间中，边疆更多地指涉文化的边缘区域，并在治理层面更多地以化外之地、羁縻区域的形象加以呈现。在这种总体框架下，“天下”实际上成为涵摄整个古代中国的道德与秩序标志，不仅涵盖了地理意义上的中原与边缘区域，而且还塑造了一个具有自身能动性的边疆类型，一种能够经由社会转变、道德提升而实现地位跃迁的文化边疆类型，正所谓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例如，《隋书·地理志中·谯郡》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南阳古帝乡，播绅所出，自三方鼎立，地处边疆，戎马所萃，失其旧俗。”⁸在边疆与中心之间，最重要的是文化层面的差异，地理位置反倒是其次的。

这种中国王朝本土知识下的边疆，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往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与中原内部治理事务相对应的，附属于古代中国内部治理大框架的治理类型，成为支撑和维系传统中国内部文化认同与权力结构的重要资源。例如，《宋史·杨畏传》中就有这样的表述：“迁侍御史，畏言事之未治有四：曰边疆，曰河事，曰役法，曰内外官政。”⁹又《宋史·吴昌裔传》曰：“将帅方命，女宠私谒，旧党之用，边疆之祸，皆此阴类。”¹⁰在这之后，

¹ [德]卡尔·施密特著，刘毅、张陈果译：《大地的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18页。

² Thomas M. Wilson and Hastings Donnan, eds., *Border Identities: Nation and State at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Cambridge, 1998, p. 9.

³ Frederick J.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893, pp. 197-227.

⁴ [美]诺曼·J. G. 彭斯著，袁剑、刘玺鸿译：《法国“自然边疆”观的起源》，《中国边疆学》第十辑（2018年第2期），第253-265页。

⁵ 参见 John Francis Bannon, *The Spanish Borderlands Frontier, 1513-1821*. Albuquerque, 1963.

⁶ J. R. V. Prescott, *Political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Boston, 1987), p. 1.

⁷ Lamar and Thompson, eds., *Frontier in History*, p. 6.

⁸ 《隋书》卷三〇，志第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843页。

⁹ 《宋史》卷三五五，列传第一一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1184页。

¹⁰ 《宋史》卷四〇八，列传第一六七，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02页。



《明史·李俊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述：“今或一监而丛一二十人，或一事而参五六七辈；或分布藩郡，享王者之奉；或总领边疆，专大将之权；或依凭左右，援引儉邪；或交通中外，投献奇巧。”¹《明史·袁化中列传》中则曰：“天启元年二月疏陈时事可忧者八：曰宫禁渐弛，曰言路渐轻，曰法纪渐替，曰贿赂渐章，曰边疆渐坏，曰职掌渐失，曰宦官渐盛，曰人心渐离。”²以上官方正史中的叙述结构，就将“边疆”作为与其他治理内容并行的议题，放到整个治理结构中加以考量，并在某种程度上为“边疆”赋予了某种能动性，使其不再是与土地、地域等相类似的区域性指称，而是跟整体的文化中国框架形成了内在关联。

尽管世界史中的近代与中国史中的近代时限存在近两百年的时间，但知识的碰撞却不会因断限的不同而消隐不见。早在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之际，双方在对世界与中国周边的认知方面就已经有了观念上的碰撞。在马嘎尔尼的回忆录中，就记载了他与和珅的一番谈话：“正事之谈判毕，相国又与吾闲谈若干时。先问余路上情形如何？次问余一路航海曾在何处停泊？停泊时，所为何事？余一一约举告之。述至交趾支那多伦海湾时，相国言：彼处乃我们中国的藩属。余曰：贵国声威四布，远方臣服，敝使殊为欣喜。彼人问曰：俄罗斯与英吉利相去多远？目下两国要好否？意大利与葡萄牙两国与英吉利国相近否？臣服于英吉利国否？余乃用中国里数说明英、俄两国相距之远近。又言：目前英吉利国与世界各国都甚要好，与俄国女皇亦很和睦。但吾英国皇帝陛下居心仁正，以保障和平、扶助弱国为心。曾有一次，俄罗斯女皇欲发兵与土耳其国打仗，侵夺其地面，吾英国皇帝出面干涉，使俄国不逞志于东方，以致两国不免稍有芥蒂，然现在仍很和睦，并无战事。至于意大利、葡萄牙两国则与英国相去甚远，且并非英国之属国。然吾英国皇帝乃西方盟主，对于各国均用友谊联络之、用正义保护之，对于意葡两国亦然，两国之于英国在实际上亦甚有关系也。”³这段记述所体现的中国与西方之间在外部认知上的差异，实际上恰恰是双方对于自身中心-边疆-域外整体性观念的系统差别。当时的清朝统治层对于外围世界的认识实际上是内部观念秩序的对外延伸，以对内部认知的逻辑和框架来思考和认识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外部世界，自然就会形成知识层面上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在近代的国际交往背景下，在边疆领域鲜明地体现出来。

二、中国叙述的两难：整体性与历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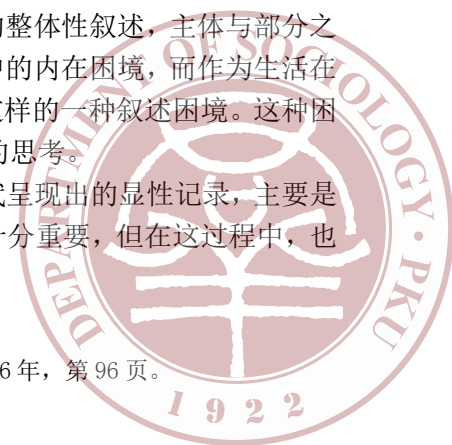
当代的世界，由于国际关系的主体依然是国家，对于国家的认知构成了我们理解世界及其内部运作逻辑的知识基础。而作为一个兼具历史性与现实性的文明大国，如何对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及其内部的多样性进行有效的叙述，进而构筑与域外文明所不同的结构与框架，就成为边疆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在我们当下，中国叙述存在着一种“两难”，一方面，存在着古代中国空间的区分性叙述，这主要表现为古代史叙述中的中原王朝与周边地方政权；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近代转型期的存在，体现在中国叙述层面，还有一种对于近现代中国空间的整体性叙述，在这当中，中国近代的整体走向以及边疆危机的浮现成为一种基本框架，中国领土疆域的主体维系与部分沦陷构成了这种叙述的主线之一。如何形成对于古代与近代中国的整体性叙述，主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历时性上加以厘清，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叙述中的内在困境，而作为生活在中国空间的中华民族，在面对古代与近代的时代变迁时，同样面临这样的一种叙述困境。这种困境，促成了我们对于作为思想史之一部分的中国边疆及其边疆叙述的思考。

我们当代的历史叙述中存在显性与隐性两种记录，在古代与当代呈现出的显性记录，主要是以王朝序列为主轴的历史，这种历史对于构筑我们的整体认识当然十分重要，但在这过程中，也

¹ 《明史》卷一八〇，列传第六八，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4780 页。

² 《明史》卷二四四，列传第一三二，北京：中华书局 1974 年，第 6340 页。

³ [英]马嘎尔尼著，刘半农译：《乾隆英使觐见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96 页。



会出现一些认知层面的内在困境，具体表现为作为王朝边缘区域的定位与地方政权的定位之间形成某种认知冲突，例如，明朝的东北叙述与后金政权的自我叙述之间，在当代文本中如何呈现，就成为一个难题，需要知识界形成新的共识。事实上，“新清史”的叙述空间正是在这种暂时欠缺共识的叙述难题中形成的。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处理好这样的问题：“隐性的记录”在一个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历史空间中如何呈现，怎样呈现？

在这种期待中，我们需要在王朝史的叙述框架之外，更好地去理解作为区域、文明与历史连续性的边疆空间。作为区域的边疆，往往是呈现一种碎化分布的态势，但在各边疆区域之间如何建立和叙述内在的关联性，从而确立边疆的区域化框架，值得深入思考。在既有的研究中，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史对此涉及较多。作为文明的边疆，所指称的更多的是其自身所具有的地方性传统，在这方面，民族史的叙述较多。作为历史连续体的边疆，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认知的新框架，在中心区域历史变迁的同时，边疆部分存在怎样的历史性变动？中心与边疆之间的联动关系如何展现？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叙述较为欠缺，而这正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方面。

三、边疆研究的阶段性及其逻辑特质

随着政治理念的变迁与地缘格局的调整，世界范围内传统的帝国与王朝纷纷向民族国家结构转型。在这过程中，关于这些政治行为体的相应知识也被逐渐更新，关于国家、政权、区域的相关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结合到中国近代的语境转变，在古代曾经长期具有属人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藩部-部属结构与分类随着近代王朝与国家治理的转变而逐渐消解，具有属地特质的边疆结构及其相应的历史叙述逐渐形成，并成为作为帝国结构继承者的民族国家结构化叙事的基本分类。

进入近代，在社会与学术的转型中，中国的边疆研究同样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面对外敌入侵，当时的学人开始在历史中找寻可能的应对之道。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边疆研究更是担负起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为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而关键的学术基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摆脱了当初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开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认识和面对内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边疆地区在中国-域外的国际交往中所起到的连接枢纽地位，这既不同于古代中国语境下对于边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积贫积弱背景下基于国家独立与巩固而对边疆在国家内部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安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更多地面对当代边疆地区发展及其内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这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当代最为重大的转变。¹

如果我们结合中国的历时性来观察，就会发现，边疆研究本身也存在一个周期性的节律变化，具体体现在阶段性特质及其内在逻辑方面。与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分析相对应，古代的边疆研究具有一种内在的循环特征，王朝的边疆施治成为叙述的中心议题，其学术高潮则是具有总括性的西北史地学，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乾嘉以来既有学术资源的一次能量绽放，是传统士人以传统学术来应对新问题的一声绝响。”²而一旦封建时代走向终结，这一研究就面临学科对象与方法上的巨大转变。近代的边疆研究具有革命性，这与广义上的近代史指向相一致，救亡图存的特征在边疆叙述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边政学作为近代边疆研究的一大高潮，一方面在近代的边疆危机中得以蓬勃发展，而另一方面，随着抗战及二战之后中国边疆危机的整体性解除，在短期内便不再成为学界关注的中心。从整体历史来看，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民族国家化”的一部分。结合到自身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近

¹ 袁剑：《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与比较可能：基于美国、法国、泰国边疆概念研究的分析与启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² 郭丽萍：《绝域与绝学：清代中叶西北史地学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06页。

代历史的一种具体而微的缩影，在研究内容方面也成为近代史在边疆地区的投射。那么，在当下，随着时代特质与时代主题的变化，我们如何在边疆研究中超越既有的循环性与革命性叙述，形成新的范式与框架？

四、中国边疆的近代“呈现”：一种独特性

尽管中国有着长期绵延不断的历史叙述，但中国边疆空间的形成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独特性。在帝制时代，中国边疆主要体现为王朝所羁縻的边地，边患时有，但不足以形成整体性的边疆危机。边疆危机的“呈现”，是在清朝进入由西方殖民帝国力量所型塑的民族国家语境而形成的产物，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近代生成的。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对外域诸国如土耳其、波兰等认知的深入，国内知识界开始意识到本国正在同样经历一个千古未有的“丧权辱国”阶段，其中包括所谓的“割地”、“失地”之痛，这种痛苦不仅在于其勾起了关于过往诸如“燕云十六州”、岳飞北伐功败垂成的王朝史的记忆，而且还直接指向当时的场景甚至未来的走向。正如相关研究者所指出的：“1898年以后，就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曾作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形式和保证人的王朝国家结构，而去设法解决中国与日俱增的危机的办法的时候，他们也首次开始将现代世界视作一段进行中的历史进程。”¹在同时认识外部世界和内部状况的背景下，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真正意识到外部世界与中国本身在重大事件上存在的某种同步性，并以此来理解与认知作为中国与世界相连接区域在这种同步性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中国的边疆逐步在近代史的进程中“呈现”出来。

因此，严格意义上的以边疆危机及其应对为问题核心的中国边疆研究，实际上是在传统王朝向近代民族国家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只有在这一时期，边疆才真正具有了特定的含义，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弥散无边的羁縻区域，而成为民族国家地缘机体（geo-body）的一部分，或者说，其所体现的空间意识就是“边疆成为民族国家地缘机体的组成部分”。因此，相应地，中国边疆研究的几次高潮，基本上都出现在近代或者说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段内，而清代之前的各朝边疆研究，尤其是关于各朝边疆地区的叙述，往往都是后出框架的前推，都无法被归入相应的边疆研究历次高潮范围内，甚至都算不上具有学术自觉性的边疆研究。可以说，中国的边疆研究本身就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历史研究的“民族国家化”的一部分，结合到自身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一种具体而微的缩影，在研究内容方面也成为近代史在边疆地区的投射。近代的“边政学”则更多地凸显出20世纪上半叶国际时局与内政治理的特定需求，更多地具有时代性特征，所展现的则是将边疆视为与“内政”相对应的政治治理空间（边政），并随着抗战结束、外部侵略危机的终结，民国政治背景下的“内政”/“边政”空间分野被新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话语取代而逐渐销声匿迹。总体而言，中国近代的边疆研究以及“边政学”的发展，都离不开各自特定的时代精神，也都对应着各自的“空间意识”。

五、文化空间意识：边疆区域分类与拉铁摩尔的学术实践

包括边疆史在内的历史，离不开文化的语境与认知。钱穆先生曾提醒我们：“说到历史的特殊性，则必牵连深入到全部文化史。政治只是全部文化中一项目，我们若不深切认识到某一国家某一民族全部历史之文化意义，我们很难孤立抽出其政治一项目来讨论其意义与效用。”²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寻找特定时代的文化空间及其内部逻辑，将为我们理解历史及其实践提供更全面的

¹ [美]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1页。

²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外部基础，对边疆议题的思考也概莫能外。

在“空间意识”的框架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或类民族国家都将面临内部区域分类的问题，并因各自的文化背景而形成不同的分类叙述方式。在传统中国的历史空间叙述中，边疆往往附属于中心区域的叙述逻辑，在以“人群”治理为旨归的治理需求下，对于边疆空间的认知附着在对生活在当地的少数民族的认知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边疆自然是随着相应人群群体的变化而流动，无法进行完全固定化的区分。即便到了清朝，疆域范围大致底定，在理藩院的治理范围（“疆理”）部分，则分为内蒙古部落（卷963）、外蒙古喀尔喀部（卷964、965）、青海蒙古部落、西套额鲁特部落、额济纳土尔扈特部落、伊犁四路各部落、科布多所属各部落、察哈尔各部落、黑龙江将军所属各部落、塔尔巴哈台所属各部落、唐努乌梁海部落、游牧喇嘛部落、回部、西藏（以上为卷966）。¹在这种叙述框架下，虽然在各卷已经隐约出现了“蒙古”、“回部”和“西藏”的区域分类，但这一分类仍然建立在对“属民部落”的分类管理基础之上，对于具体的区域空间并未有明晰的认知与分类。

在民国肇建之后编成的《清史稿》中，地理志中对于边疆区域有如下的论述：“太祖、太宗力征经营，奄有东土，首定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及宁古塔诸地，于是旧藩札萨克二十五部五十一旗悉入版图。世祖入关翦寇，定鼎燕都，悉有中国一十八省之地，统御九有，以定一尊。圣祖、世宗长驱远驭，拓土开疆，又有新藩喀尔喀四部八十二旗，青海四部二十九旗，及贺兰山厄鲁特迄于两藏，四译之国，同我皇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氍毹湮酪之伦，树颌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乡，诚系本朝。……穆宗中兴以后，台湾、新疆改列行省；德宗嗣位，复将奉天、吉林、黑龙江改为东三省，与腹地同风：凡府、厅、州、县一千七百有奇。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重之以屏翰，联之以昏姻，此皆列帝之所怀柔安辑，故历世二百余年，无敢生异志者。”²这一叙述则将边疆区域放到清朝历史演进的时间维度中加以叙述，但同样没有从整体上将边疆区域以空间的方式进行类型化的划分，而是以文化区域多样性来体现边疆的空间特质。这种清朝统一语境下的独特性，对于我们认知当时和之后的中国边疆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正如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统一是国家主权和最高行政权力的集中，而不是文化的一致，更不是用一种文化去消灭或代替另一种文化。相反，一个真正稳定繁荣的统一国家，必定会容忍并鼓励多种文化的存在和发展。”³

作为一个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且毕生都在关心中国命运的学者，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首次从空间与社会生态角度，对中国边疆区域进行了满洲（东北）、蒙古、新疆、西藏的四区块类型化划分。他在文中写到：“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又从帕米尔高原南下，到达分隔中国与印度的高寒地带，在这个范围内所包括的是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这是亚洲中部的隔绝地域，世界上最神秘的边疆之一。这一边，限制了中国的地理及历史，正和那一边海洋的限制一样。”⁴这种划分在后续的学术研究和现实实践中，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尽管不可否认其存在不足之处，但至今仍旧是研究中国的著作中主流和基本的陆疆分类模式，其知识分类的影响延续至今。⁵

拉铁摩尔的这一划分，当然不是神来之笔，而是建基于他对当时历史与地缘情境的深刻洞察。他指出：“虽然在中国的南海、印度洋、地中海、欧洲的大西洋岸及北冰洋之间有世界最大的一

¹ 参见[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

² 《清史稿》志二十九。

³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36页。

⁴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⁵ 袁剑：《拉铁摩尔：学术的遗忘及其复归》，《华西北疆评论》第4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年，第218页。



片陆地，其东部和西部的历史进步过程却不一样。直到我们今天，产生一个新时代的可能性才表现出来。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对旧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它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其他各地的地理的、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¹在他的那个时代，历史的展开方式与过去的数百年已经大相径庭。传统中国语境下来自北部的蛮族压力，如今已经转变为来自各方面的殖民帝国压力，传统的长城边疆如今失却了其政治军事层面的重要性，却在生态和生产方式层面获得了新的意义。

当然，在这过程中，拉铁摩尔本人也经历了观念上的重要提升，他在结合对中国地缘格局的思考后，强调具体田野实践的重要性。他本人曾经“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从东北经过内蒙古到新疆，在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旅游和学习”，²而“他在中国的居住、调查和短期旅行，使他对中国的自然、地理、经济、政治和人情风貌，产生了朴素的感情，同时由于他亲身接触现实，使他能通过某些群体的日常活动去理解历史”。³其中，对语言的学习是很重要的环节。在他看来，这是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尤其是边疆社会的重要工具，他后来回忆道：我“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此外，我还想学蒙古文，因为直到那个时候为止，我们在蒙古的旅行完全是由中国商人和士兵陪伴的”，⁴在他看来，“为了解蒙古人的观点，有必要掌握蒙古语。我必须能够同普通人民交谈，同那些既不是封建贵族也不是政客的人，同那些最少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不讲汉语的人交谈”。⁵这种基于对中国边疆内部各区域社会文化独特性的认知，使拉铁摩尔在分析边疆问题时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文本，而在同时也开始重视当代边疆社会意识与认同的深层影响。在这之后，当中国学者于20世纪40年代介绍拉铁摩尔的作品时，也认为他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文初版名为《中国的边疆》）的写作，“酝酿十年之久，把他自一九二六年以来历次在中国边境各种旅行的观察心得，及与其他专家们研究认识的结论，融化会通，写成这一本约二十万言的巨作。他除汉文之外（拉氏的汉文程度在外国学者中，并不算太差），兼习俄文和蒙文，再加其原有的德文和法文知识，使他能直接涉猎中英法德俄各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边疆的书籍，同时又用汉语和蒙语作实地访问，所以材料来源，相当渊博。这一本书以中国的四大边疆地区——东北的森林、内外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沃洲、西藏的高原——为研究对象，随时以中国内地的情况作比较研究，并且特别注重中国的汉族文化及边疆民族文化的接触与相互影响，十足表现‘边疆观’的风尚……文中力求严谨，仍不失为有价值的著作，特别在中国自己现在没有一本有系统而且概论整个边疆的好边疆史，拉氏此书是值得细读的”。⁶当时的论者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边疆，赖氏（即拉铁摩尔——笔者注）也强调‘边疆社会’的重要——这是‘边疆观’的最显明的表现之一。由于两种不相等文化的接触和互相渗合，‘边疆’事实上成了一个过渡地带，既不属于严格的‘汉族文化’，也不属于严格的‘野蛮民族文化’，而只是依当时情况之不同，徘徊于二者之间，忽而汉，忽而野蛮而已。看清了这一点，则对中国边疆的消息，即可有明确的认识。这种看法是显然比‘入寇’、‘征伐’的看法高明得多。对整个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我们自己作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据历代官书，以汉族的观点去研究。外国作家们又因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每作偏论，赖氏此书虽

¹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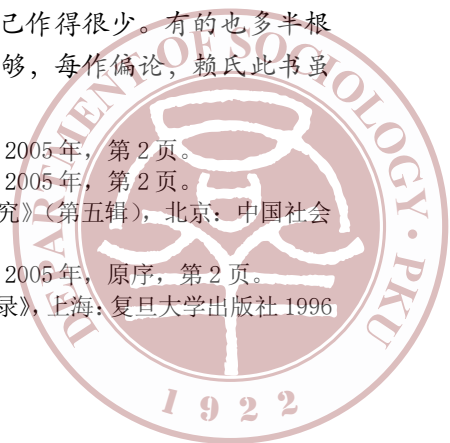
²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页。

³ [日]毛里和子著，张静译，樊守志校：《论拉铁摩尔》，载《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五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⁴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原序，第2页。

⁵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吴心伯译：《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

⁶ 赵敏求：《书报春秋：中国的边疆》，《中央周刊》1941年第3卷第42期。



不能称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于其亲身经历之广（他是国际上有数的中国通，特别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极其丰富，处理的手法就整个而论，也相当适当……”¹。这些评论和判断，较为明显地指出了拉铁摩尔与秉持传统“入寇”、“征伐”观的中国学者以及对内部逻辑不甚了了的外国作家的不同之处，即独特的边疆分析结构与整体视野。

从功能上来说，这种边疆分析结构作为一种类似于韦伯“理想类型”式的分类框架，在具体的操作中较为有效地将中国内部中原核心地区与边疆地区的内部关系转变为可供分析的多对关系（如中原-蒙古关系、中原-满洲关系、中原-西域关系、中原-藏地关系等），从而既适应经历近代国体转型的中国内部对各边疆区域有侧重性的政治与文化表述，同时也成功地使这种边疆类型学融入当时既有的学术范式（蒙古学、藏学、突厥学以及满-通古斯研究等），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国家与学科间的“协调”。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何在民族国家基本结构下，更好地思考和认知国家空间与相关学科框架之间形成的新的结构性关系，将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六、边疆分类与国族叙述：难点与问题

如何实现国族与疆域的合一性叙述，始终是近代各个帝国力图达致的目标，为此，有很多相伴的理论应运而生，如法国的“自然边疆论”²、英国的“科学边疆论”等³，都力图形成各自关于边疆的叙述话语，并与帝国的整体论述相契合。近代中国经历了一个从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疆域版图本身无法实现全然的断裂，而清朝政治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满-蒙贵族阶层则在民国肇建后失却其崇高地位，其政治话语被“五族共和”的新表述所取代，因此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如何在新的族群政治框架下继续有效维系既有疆域版图的问题，换句话说，如何使国族与疆域彼此契合，两者之间的契合需要怎样的逻辑。

在这种语境下，传统对于历代王朝边疆区域的宗藩式表述，在清朝曾经的满-蒙联合统治结构被替代的情况下，就变得有些无以为继，但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在习惯并认可了清末受内外压力而形成的中国疆域版图之后，必须以新的边疆分类表述来替代原有的宗藩结构，并在同时维系对这些边疆地域的合法性叙述。唯一现实的路径就是对清中期最终奠定的宗藩结构加以改造，保留其指涉地域的部分，而抽离其指涉族类和政治结构的部分，从而将之转变成以区域指涉为主的边疆结构。由于受到清末民初的汉民族主义影响，宗藩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作为负面遗产对待，不受学界和思想界欢迎，但随着现实政治的发展，思想界发现，当时的时局已经无法在既有的宗藩结构之外打造一个全新的对庞大疆域版图的解释模式，因此就必须对宗藩结构加以再利用，以五族共和作为中国当时族际整合的基本话语，并力图以此涵摄之前宗藩结构下的族类人口，

但这样的一种期许，依然面临一种如何协调“空间”与“人群”的问题。我们发现，固定化的边疆（空间），在表象意义上可以更好地通过地图化的方式加以凸显，进而形成关于中国的地缘机体（geo-body），但是，在近代，民族分类却始终无法加以确定与固定化，进而就无法通过地图编码的方式加以明确地表征，因此就使得中国的内部族类机体（ethno-body）不很清晰，因此在族类与地域之间缺乏完整的对应关系，故而在具体实践层面，五族共和话语缺乏对原先藩部所属区域的强化与认同。因此，从现实的需要出发，确立在整体国家认同范围内的边疆类型化结构就具有了现实的必要性。拉铁摩尔的边疆分类框架，实际上正是这种话语期待过程中的一种尝试性的实践，当然，这种实践也是可以讨论和质疑的。

¹ Owen Lattimore 著，赵敏求译：《中国的边疆》，重庆：正中书局 1941 年，引言，第 1-3 页。

² [美]彼得·萨林斯著，袁剑译：《再论自然边疆：17 世纪以来的法国边界》，《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7 年第 4 期。

³ 袁剑、刘玺鸿：《“科学边疆”及其实践：19 世纪后期英国围绕印度西北边疆的治理策略与影响》，《世界历史》2018 年第 6 期。

七、以边疆论国家：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

古代中国强调德化，对于国家的认知也更多地与道统相联系。随着近代世界秩序的大变动，作为道德空间的、在某种程度上虽然在外力压迫下确定了边界但依然拥有“天下想象”的以“大清”为国号的中国，开始逐步承认自身处于一个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承认世界各国共存，则必须放弃自身的崇高性，并将自己之前较为模糊的“德化”边疆明晰化，从而形成“国内”与“邻国”的明确认知。当然，这个过程充满着顿挫，并在历次战争失败或不平等条约签订前后变得更为曲折，而在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失败之后，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1898年以后，就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抛弃曾作为‘中国’不可避免的形式和保证人的王朝国家结构，而去设法解决中国与日俱增的危机的办法的时候，他们也首次开始将现代世界视作一段进行中的历史进程。”¹而就事件的指示性而言，“它们帮助中国指明了一个基本问题和一个新的机遇。这个问题是：一个由历时性的达尔文主义所展示的世界，如何能够在势不可挡的欧美、日本强权的环境下被建造为全球重建的活跃场域。这个机遇是：这个世界如何能够被转变为一个普遍存在的舞台，来供中国人和同伴们反抗构成他们的共同世界的全球不均衡性。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转折点上有意地进入和建造的有关认同和接近的世界舞台的复杂形势；就是在这个舞台上，种族、斗争、革命和关注亡国的意识，合并为一个共时的现代全球的时间性及不均衡的全球空间性，这便允许了中国和全球空间性的非中心化，并使得亚洲、太平洋、非洲和其他地方进入视野，它们不是作为惰性的地理名称或不幸的亡国之地，而是作为创造和表演崭新的全球、国家和地方的意义、实践、历史的具体场所出现的。”²这种现象在当时的出现，自然离不开对于域外国家与地区的认知图景的确立，同样，也必须建立在对这些图景的共时性认知的基础上。这与近代之前中国对于外部世界的滞后性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样的语境下，如何理解和认知外部和周边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中国如何理解自身内部进程的一种重要折射，而与外部邻国相接的中国内部宗藩地区的重新认知和分类，在认知层面就相应地成为连接中原核心地区认知和周边邻国认知的一个桥梁。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理解边疆在中国“由内到外”的内生结构关系以及“由外到内”的外在结构关系中所呈现的不同角色定位，也就在成为不同时期边疆话语构筑的语境与主题。

很明显，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建立，受域外强权的压迫，以边疆结构为分类基础来重塑中国核心区域之外的版图基础，成为近代中国边疆话语构筑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边疆在某种程度上更多地是一种“由外到内”的外在结构关系下的定位，因为当时的诸多边疆地区正处在外部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当中。而在抗战的过程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外部压迫，伴随着中国学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讨论，也相应地推进着学人在中国边疆地域认知方面的深化，拉铁摩尔一书中的边疆分类框架，正如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时间一样，恰恰正是这一历史时局及其思想史进程的鲜明反映，因此也随着相关讨论的进一步推进，在当时的语境下形成了具有独特辨识度的“拉铁摩尔逻辑”。

八、当代治理下的边疆路径：超越“拉铁摩尔逻辑”的新可能

当代的世界已经不再是一百年前的模样，新的经济组织方式与国家间关系已经彻底重塑了当

¹ [美]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1页。

² [美]卡尔·瑞贝卡著，高瑾等译：《世界大舞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1-22页。



下的民族国家结构，在经历了 19 和 20 世纪的帝国结构大崩解和亚非拉地区反帝反殖运动，民族国家确立起整体性的基本结构，与之相应地，国家叙述在客观上成为超越民族叙述与区域叙述的主导性话语，并一直延续至今；而随着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终结，曾经一度被意识形态竞争所遮蔽的区域民族主义乃至民粹主义开始重新浮现，对世界各国构成新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具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中国本身，同样经历着内外环境的变迁，并深刻地感受到这些变迁对于理念与实践的巨大冲击。因此，如何理解外部世界的变迁逻辑及其中国在新世界场景下的新意义，就成为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边疆这一“属地”特征认知对象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内外部结构关系的新构型提供了更具一般性和贯通性的解释可能，而这也成为“拉铁摩尔逻辑”贯穿近现代中国边疆认知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在迈向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之前的革命话语逐步淡去，面对各种挑战，当下的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整合性话语，来对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整体性与统一性进行有效与贯通的阐释。可以说，近几年关于何谓“中国”的讨论本身就是这种阐释焦虑与需求的外在体现，但是，这种讨论大多着重于对于整体性结构的分析与阐释，对于边疆区域如何成为中国组成部分的动力学机制的思考尚显不足，只有在当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真正历史与空间是什么的前提下，只有在我们更好地理解包括边疆区域在内的中国的整体性生成与发展的思想史源流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一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兼具过去经验与未来路径的意义。当然，在这种讨论中，诸多的理念试图提供可能的操作性方案，例如，儒家秩序或者说“国学”的复归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尝试的选择之一，但问题在于，儒家对于天下的认知主要是基于道德普遍性的，对于当今现实的国家地缘现实往往并不在意，因此，当面对一个疆域明确，同时又需要对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统合叙述的民族国家结构时，建基于中原实践经验的儒家既有的一整套话语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需要其他部分加以理论增补或者调适。

在这样的背景下，围绕当代的国家治理，在既有的民族区域治理框架下，随着边疆架构的生成，新的边疆治理框架也在逐渐成为一个某种程度上具有并行性的框架。与民族区域治理结构中所强调的民族关系路径不同，边疆治理结构中更强调的是中央与边疆区域之间稳定的结构性关系。此外，由于中国本身从近代到当代这一进程中对于外部世界的关联性的加强，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周边与域外国家国际关系格局的确立，边疆区域本身不仅依然是中国国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还在中-外结构关系中扮演新的角色，如何在认知这种结构性关系的过程中，如何在系统性地思考中国“由内到外”的内生结构关系在边疆区域的生成与发展的同时，兼顾各边疆区域的“对内地”与“对外域”关系特征，并进而认知和面对在当代流动性增强的背景下出现的“移动”与“跨界”现象，就成为我们在当代超越既有的“拉铁摩尔逻辑”，进而构筑新的边疆认知框架和思想史叙事的前提与基础。在对于中国本身的整体思想史思考之外，如何构筑关于中国边疆的思想史进路，寻找一种基于人文-地理关系的“边疆思想史”的解释可能，当代中国的实践正在为这种新框架与新叙事提供新的空间与可能。¹毕竟，我们只有在理解了边疆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说是真正理解了整个中国。我们也相信，身处中国大地、怀抱“家国情怀”的中国学者与学界，将会在这个基础上，作出具有超越性的认知与贡献。

九、边疆思想史：一种叙述可能

面对上述的诸多叙述困境与现实需求，我们有必要更为深入地去思考如何形成一种兼具时空连贯性与整体性的边疆认知框架，并形成连续性叙述。思想史方法作为一种独特的认知路径，曾经为思考中国在制度、核心意识形态以及文化认知方面的连续性与整体性提供了充满解释力和启

¹ 袁剑：《边疆思想史：理解中国及其时空构成的一种可能路径》，《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



发性的成果，同时也激发了一代代学者对构筑中国意识与中国观念的相关问题的追问与思考，这种认知路径如今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对于中国文明，美国著名的思想史大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提示我们，即便是在我们现在认为是核心中国的区域，依然具有相当程度的地区间差异，“鲁国常常被看成是古老的周王朝‘古典’传统的中心地带。北方的海滨地区燕国和齐国是巫术和萨满思想模式的故乡。楚国则是极其华丽的宗教幻想的故乡（据某些‘道家’传说）。与此同时，据说西北边陲地区的半野蛮国家秦国民风简朴而坚韧，为法家思想模式提供了理想的‘民众基础’。中原地区历史悠久、建国甚早的国家，与北部、西部、南部边陲新的‘半野蛮’国家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这些在典籍中对此有敏锐的反映。然而，即使将这些思想模式归因于地区起源的说法是恰当的，由于它们逐渐地发生变化，最终在一个共同的话语框架之内相互作用，在公元前的第一个一千年内终于形成了一个共同文明。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思想模式之中，存在着许多共同的前提假设，它们都出自大家共享的古老文化取向。”¹这就表明，在中国思想史的形成过程中，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中心-边缘相互作用的趋向，“边缘”思想逐步被纳入到“中心”思想当中，并形成更具超越性的“共同”思想。

在这种思想成型的过程中，经由春秋战国而导向的秦汉时代是一个关键的阶段。正如钱穆先生所指出的：“秦末之乱，生民涂炭。然此特一时政治之失调。若论其时中国民族精神，则正弥漫活跃，绝无衰象。故及汉之兴，休养生息，未及百年，而已元气磅礴，蔚为极盛。秦有谪戍之法，移民边徼。及秦乱，中国之民，又相率避地奔亡。然皆能自立塞外，播华族之文风，化榛莽为同域。”²在秦汉确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周期的同时，也构筑了民族结构层面的开放性空间，并将其导入整体意义上的中国思想史框架当中。

在历时性的理解中，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古代的中国在更大程度上与其说是一种政体结构，不如说是一种文明框架，它将天下观念纳入自身的运作秩序当中，进而构筑了一种超越单一族类指向的整体空间认知。在这种基础上，一直到近代为止，中国自身的世界认知始终是“无外非中”的，所谓的域外知识始终是本身秩序的附着物与补充者。在费正清的笔下，古代中国的世界秩序表现为一种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制的圈层结构，第一个是汉字圈，第二个是内亚圈，第三个则是域外圈，这三种圈层结构塑造了古代中国的对内与对外认知框架，而各个统一王朝的总体政策都围绕这一圈层结构加以设计与执行。³进入近代，随着中国传统世界认知框架的重构，中国观念中的“天下”逐渐失去了其本身所具有的普世性意义，而内缩为一种与本国疆域空间相重合的国家结构，它不再具有某种文明共同体的特质；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在传统意义上能够被囊括进“天下”叙事框架的中心-边疆结构，在近代以来对外部世界的区域化认知中，形成了我们如今已经习以为常的“中国-世界”框架，而在这种框架中，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域内”与“域外”的两分式结构。

在这种既有的框架与结构中，前文所述的关于中国叙述的两难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影响着对于我们自身与世界的认知。其中，如何在当今的民族国家结构中理解“天下”的生成逻辑，如何去认识费正清所指出的古代中国世界秩序中的第一圈与第二圈之间的关系，进而更全面地理解“域内”的空间与互动关系，就构成了我们思考和寻找具有整体性的中国叙述框架的关键所在。

以此为出发点，基于为中国历史空间中具有连续性与关联性的边疆区域构筑整体叙事框架的可能与尝试，“边疆思想史”作为一种非区域和超区域层面的结构思想叙述，它不单单局限于对

¹ [美]本杰明·史华慈著，程刚译，刘东校：《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8页

² 钱穆：《秦汉史》，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39页。

³ [美]费正清编，杜继东译：《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中央王朝对于边疆区域及其生活其上的诸族群的治理政策与思路的梳理与考察，而是建基于对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中原-边疆关系认知框架及其内部群体与政策互动关系的整体关系揭示，着重关注的是中央政权边疆政策在边疆区域内部的创造性转化与在地化实践，以及在这种转化与实践中所生成的内部关系逻辑及其网络。通过揭示边疆区域内部的这种内部关系逻辑与网络，边疆思想史将能够超越既有的对于边疆的区块化认知，从而形成中原-边疆关系的整体互动关系，并在透彻理解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一统”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对历史与当下中国时空连续性的新认知。在文化的层面上，它无法回避整体的道德感与真实性问题。

“边疆思想史”之所以是可能的，在于我们当前有切实的必要从连续性中寻找一种叙述边疆的整体性路径，这基于两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边疆知识逐渐成为弥补曾经断裂的世界与中国之间空间的“普遍”知识分类，超越了古代原有的藩部话语，与中心区域话语共同构筑了与民族-国家结构范围相一致的中心-边疆结构。“边疆空间”成为“少数民族”的事实性生活空间，而由于“边疆”存在地域层面的联系性，因此构成了构筑“边疆思想史”的可能性。在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连贯性叙事与近代国外的区域性和世界性学术（如汉学与藏学、蒙古学、突厥研究等，包括沿海中国研究）在当代的交错。此外，近代殖民帝国边疆概念的话语流动影响了殖民地及周边区域（如英法殖民地对中国西南和南部边疆的话语影响、俄国、日本对中国西北、北方和东北边疆的话语影响）；上述这些，都为“边疆思想史”提供了现实的研究基础。

当然，在对“边疆思想史”的整体性叙述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存在的难点，即如何处理近代中国的边疆叙述与古代边疆认知方面的逻辑衔接，如何面对关于中国叙述层面形成的几套基本框架——中原-王朝认知框架、内亚-帝国认知框架、华南-区域认知框架等等之间存在的共识、交错与冲突，以及如何处理边疆区域内部之间的思想性关联等。揭示这种“边疆思想史”，将能够有效地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边疆”所起的纽带作用，在历时性的维度上，边疆这一历史空间所指涉的不仅是人群的共同体，更是地域的共同体。此外，作为一种新的思考路径，经由“边疆思想史”的认知角度，也将为“跨界民族”、“边界观念”等议题提供新的解释空间与框架。在具体的切入点方面，“边疆群体”和“边疆人”将是未来可能的叙述重点和方向。在另一个层面，对于“边疆思想史”的讨论，还涉及对于其内涵、与“一般思想史”的关系、具体的学科基础、民族与边疆之间的结构性关系、中国文化与认知的圈层结构与边疆话语的关系等，所有这些，都还值得进一步探究与讨论。

